

论句法关系的来源与功能¹²

罗仁地 著

杨旭 译；李姝姝、罗仁地 校

0. 引言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 1 节讨论交流的基本性质即示意和推理，以及语言的本质是制约交流中的推测过程。第 2 节中讨论句法关系的性质，即句法关系是对指称和角色识别的推测的制约，这种制约是具体到每个结构的。第 3 节讨论在一些语言中，语言形式尤其是句法关系是如何习俗化的（语法化或词汇化），即某种特定的标记或（共同）指称模式在结构中不断重复，直到这种标记或对（共同）指称的推测变得习俗化；此外还讨论了该过程在交际方面对这些语言意味着什么。第 4 节讨论在那些有句法关系的语言中，为什么句法关系会发生语法化。第 5 节呈现结论。

1. 交流的本质：示意与推测

1 本文是澳大利亚语言学会年会的语言变化研究中心语法变化工作坊（2006 年 7 月 7 日至 9 日，昆士兰大学）的主旨发言。我要感谢组织者 Mary Laughren、Jennifer Hendriks 和 Rachel Hendery 的邀请，同时也要感谢当时对论文发表意见的人。

2 引用：LaPolla, Randy J. 2006 The how and why of syntactic relations. Invited plenary address and keynote of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Language Change Workshop on Grammatical Change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Linguistics Society,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7-9 July, 2006. ——译者注

所谓人际交流指的是：当一个人的行为被另一个人看到或听到时，可能会被认为带有交流意图，这时另一个人开始利用推测来确定交际者打算交流的内容。这种行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对话者³假定交流者是一个理性的人，也就是说，行动时心中有目标（参 Grice 1975），因此该行为必是出于某种原因，而且值得对话者付出努力来确定这个原因是什么，或者说确定行为的关联性。⁴我们将交流者的这种行为称为示意（ostension，来自拉丁语 ostendere，表示“展示”）或示意行为。对话者使用的是溯因推测，⁵即对话者观察到交流者的示意行为后，必须推测交流者为什么在特定环境中要对特定的人做出特定的示意行为，并由此推测交流者的交流意图是什么。这种推测会汇集一组假设，在这些假设中，特定示意行为在特定环境中对特定的人来说是“有意义的（makes sense）”；也就是说，对话者必须创造出一种理解环境（context of interpretation），在该环境中，示意行为的关联性对对话者来说是明确的。事实上，整个理解过程都涉及推测：将示意行为识别为交流行为需要推测；将示意行为的形式识别为特定语言中的特定短语或一组词需要推测；填充所谓“句意”的细节需要推测；确定交流者的交流意图（“说话者的意思”）也需要推测。交流不是也不涉及编

3 本文把 addressee 翻译为“对话者”，是作为交流者的对立面使用的——译者注。

4 交流中使用的认知机制和取得关联性（即获得意义）的欲望并非人类交际所特有。理解他人交际行为动机的欲望是理解他人一般行为的欲望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社会性灵长类动物，理解周围人的行为对我们的生存很重要），而这又是理解和搞懂周围世界的更大欲望的一部分，都是一种生存本能（这也能解释宗教）（比较 Levinson 1995）。

5 溯因是一种不同于归纳和演绎的推测法：人们观察到某个令人困惑的情况 A；在 B 为真的情况下，A 就不会显得那么令人困惑（即会有意义）；因此很可能 B 是真的。比如，当我们在街上看到某人在自言自语时，我们可能会推测他在打电话（即便我们没有看到电话），这样就可以解释他的怪异行为。这是我们创造大部分假设的基础，也是我们理解他人行为的方式。可参考 Peirce（1940：Ch. 11）、Givón（1989：Ch. 7）、Levinson（1995）。

码-解码过程；交流必需的过程并非符号交换，而是成功确定交流者做出特定示意行为的原因（更多讨论参见 LaPolla 2003、2015；关于“关联性”见 Sperber & Wilson 1996）。意义不在词语中，而是在对话者的头脑中创造的（比较 Reddy 1979）。⁶

交流者为示意行为选择的特定形式也是基于推测，即要推测什么才是特定情景下表示示意行为的最佳形式，以及哪些假设对对话者来说是明确的（即是对话者知道或可以知道的）。交流者会选择自己最省力的形式（Zipf 1949），但同时也要保证对话者可以推测出他的交流意图是什么。这就是语言的作用所在：语言是一种用来制约构成理解环境的假设集合的工具。让我们看一个例子（改编自 LaPolla 2003: 116）：

(1) 问：你想喝点什么吗？

A1：（用手指向某处）

A2：我有汤。

A3：不，我有汤。

A4：不，因为我有汤。

A5：不，因为我有汤，我不需要任何其他喝的。

A6：不，我不想喝任何东西。因为我有汤，我现在不需要任何其他喝的。

这个例子发生于一对夫妻坐下来吃晚饭时。丈夫问妻子要不要喝点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她可以采用（1）给出的任何回答。（A1）中

⁶ 另一种说法是，重要的不是说话者说了什么，而是对方理解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所理解的可能与所说的背道而驰，比如在讽刺中。

的回答要求丈夫认定她正在回答他的问题，并推测她以那种方式移动手臂表明她正在指向某物，指向某物是她用来回答问题的示意行为，他必须猜出她用手指的是什么，并推测出她指的是手前的碗，他还必须注意到碗里有汤，并推测出碗里的汤与他的问题有关，然后注意到汤很稀，并推测出是一种可饮用的液体，以及推测出她有意让他推测出这一切，进而推测出既然她有一碗可饮用的液体，那么她不需要任何其他喝的。总之，他必须将所有这些假设和推测汇总到一起，才能使得她用手指东西获得关联性。她当时也可以选择（A2），由于对丈夫寻找假设以建立示意行为关联性的理解环境的过程做了制约，因此至少推测过程中的前几个步骤对丈夫来说会更为容易。如果她选择（A3），那么该过程的另一个部分会变得更为容易，因为他会意识到其中的否定，尽管他必须推测否定定义与其余部分之间的关系。如果选择（A4），那么从属连词“因为”会使否定定义与其余部分之间的语义关系更加确定。至于（A5）将再次降低推测过程的难度，因为结论更加明确，而（A6）的明确性又更进一步。所有这些回答都是可能的，但妻子事实上选择了（A1）。（A1）对丈夫来说是最难的，但对妻子来说最为省力，她推测他有能力创造一个理解环境（即把上面提到的所有假设进行汇集），在这种背景下她的行为将产生意义，从而回答了丈夫的问题。

语言对交流不是必需的，但是会使交流者和对话者的交流更容易，就像用铲子挖洞比用手挖洞更容易一样。语言事实上是一种工具，就像社会中的任何其他工具一样，是一种更方便实现某目标的习俗化方

法。但与人们专门创造的许多其他工具不同，它不是专门创造出来的（语言大部分都不是专门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交流者试图制约对话者的推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被称为第三类现象（或“无形之手”现象），属于人为创造但并非有意创造，是一种在实现其他目标过程中的副产品，好比穿过田野的路径一样，是很多人为了达到自己从 A 点到 B 点的目标，而不知不觉集体创造出来的（参 Keller 1994）。语言结构随着制约理解环境的特定方式不断重复而得到发展，直到成为个人层面的习惯和社会层面的习俗。也就是说，某个人创造出了新的方式，如果它能帮助对话者推测出交流者的意图，那么交流者将会继续采用该形式，之后其他人注意到它有效也继续采用，直到习俗化，并成为语言的一部分。习俗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任何语言特征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习俗化。我们视为语言“规则”的东西（如果违反会产生“不合语法”的话语），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层面的完全习俗化的结构（关于语法从话语中涌现出来的观点，见 Hopper 1987、1988），而在个人层面上则是根深蒂固的行为习惯。这类结构在语言中变成强制成分，对对话者的理解过程进行强制制约。

请注意，在上面的例子中，从（A1）到（A6），意义越来越明确，推测难度越来越低，这是由于有了更多的语法和词汇成分。语法和词汇成分在整体性或分析性上有所不同（参 Lehmann 2002），但它们都可以制约理解环境的创造；在这方面，“概念”（词汇）和“程序”（语法）信息没有区别（不同于 Wilson & Sperber 1993 的观点），语境化

提示 (Gumperz 1992) 和语言的其余部分也没有区别——整个语言都是一种语境化提示。

由于语言结构是在交流者尝试制约对话者寻找关联性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即制约进入理解环境的假设集合), 因此每种语言中什么结构得到发展将取决于说话者认为何种语义域或功能域对制约理解至关重要。由于每个说话者社区都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在什么结构将习俗化到要强制制约话语的产生和理解上, 每种语言都是独一无二的。语言差异可以表现在: 哪些语义域或功能域受到强制制约 (如角色识别, 或动作相对于说话的时间), 受到制约的程度如何 (如动作相对说话的时间区分得有多细), 以及用于制约理解的特定词汇语法形式是什么 (如用来标记所有关系的形式, 可以是名词的所有格修饰语, 也可以是动词的词缀) (参 LaPolla 2003 的例子和讨论)。

2. 句法关系的性质

上面讨论的习俗化涉及语言的所有方面; 词汇和语法成分都是重复使用的习俗化的结果。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是句法关系, 它是用来制约所指识别及所指在事件或情状 (states of affairs) 中角色的习俗化模式 (参 LaPolla 2006)。⁷它可能是指称表达在小句中的位置与某种语义角色的习俗化关联, 例如在英语中, 在主动及物动词构成的小句中,

⁷ 请注意, 识别事件或情状中的所指角色对句法关系的概念至关重要。一些语言还存在其他的对所指识别的习俗化制约类型, 如泰语和汉语的类别分类词 (sortal classifiers), 但由于这些制约并不对所指的角色理解进行制约, 所以它们不被认为与句法关系有关。

如果某个所指的指称位于动词前，那么理解将被制约为该所指是动词所示动作的施动者；如果某个所指的指称位于动词后，那么理解将被制约为该所指是动词所示动作的受动者（如 **Bob hit Bill**（鲍勃打了贝尔）这个句子，英语习俗化的用法是 **Bob**（鲍勃）被理解为击人者，**Bill**（贝尔）被理解为被击者）。

句法关系也可能是名词或代词上的标记与特定语义角色之间的习俗化关联，例如在古英语中，主动及物小句中代词的主格标记将代词所指制约为动词所示动作的施动者，而代词的宾格标记将代词所指制约为动作的受动者。代词也可以附加到动词上，从而形成一致或跨指称系统（参下面的讨论）。

句法关系也可以是两个小句中的指称表达都指代同一所指的习俗化假设，例如英语中存在跨小句同指的习俗化假设，即其中一个小句中表示特定角色的指称表达，与另一个小句中的零形代词所表示的特定角色，必须理解为具有同指关系（例如 **Jim picked up the newspaper and threw it**（吉姆捡起报纸，扔掉了它），**Jim**（吉姆）的所指必须与第二个小句中省略的施动者即扔掉报纸的人是同一个人）。⁸此外也有许多其他方法来制约特定的功能域。

这些习俗化形式或结构都可以限制话语中（显性或隐性）所指角色的可能理解范围。尽管这些结构传统上都被视为同一种语法范畴，如“主语”，但它们不可等量齐观，而是制约谁对谁做了什么的理解的不同方式。此外语言之间也表现出差异，比如是否对该功能域进行

⁸ 需要注意的是，把 **it** 的所指与 **the newspaper** 的所指识别为相同不是基于句法关系，而仅仅是推测；语法并没有像对待 **Jim** 和扔报纸的人之间的关系那样对此进行强制制约。

制约，如果确实制约的话，用哪些特定结构来制约，哪些特定角色会得到识别，以及用于制约理解的特定机制是什么，这些方面都可能有所不同。我已经在另一篇论文中（LaPolla 2006；另见 LaPolla & Poa 2006；Van Valin 1977、1981；Van Valin & LaPolla 1997：Ch. 6；Dryer 1997；Croft 2001：Ch. 6）⁹给出了具体的例子，并且论证了为什么句法关系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没有形成一个单一范畴，也因此不属于任何跨语言范畴，此处不赘。接下来我想讨论的是句法关系如何发展以及为何发展。

3. 句法关系如何发展？

许多句法理论都认为所有语言都有句法关系，有些还认为所有语言都表现出相同的句法关系，特别是假定有“主语”范畴（以英语为模型），但我已经在许多作品中指出（LaPolla 1993、2006；LaPolla & Poa 2006；Van Valin & LaPolla 1997：Ch. 6），并非所有语言都表现出句法关系，即使它们确实对所指角色识别进行了一些制约，也不一定是类似于英语“主语”的方式。如上所述，词汇语法结构是在以特定方式制约理解环境的集合的重复使用过程中成为了语言的一部分，因此在个体发生（ontogenetically）上，我们都是从没有结构开始，当然也包括没有句法关系。共时层面确实存在一些语言，如 Riau 印尼语（Gil 1994）和汉语普通话（LaPolla 1993），对所指识别没有句法关系

9 还可以参看更新的文献，包括 LaPolla（2009、2017、2022）——译者注。

上的习俗化的制约（尽管可能有其他方面的习俗化的制约）。这意味着词序位置、名词或动词上的标记等与特定语义角色之间不存在习俗化关联，因此语言结构不会对语篇中提到的所指角色的理解进行强制制约。对话者仍然可以建立一个理解环境，其中示意行为可以取得关联性，但是与对该功能域的理解进行强制制约的语言相比，对话者的推测过程相对不受约束，因此需要更多地依赖“真实世界语义（real-world semantics）”的假设来取得关联性。¹⁰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会话含义了（会话含义也会影响理解）。例如，汉语（以及许多其他语言）的话题和施动者之间存在很强的频率相关性，因此存在一种话题（话语开头指称表达中的所指）就是施动者的会话含义。它只是一个会话含义，因为可以被所指的语义或理解环境的需求取消，例如“学生发了成绩”这个句子，通常被理解为“学生获得了他们的成绩”，而不是“学生给出了成绩（给其他人）”，因为学生通常会收到成绩，而不是给出成绩。在句法关系的习俗化中发生的情况是，这种会话含义在话语中出现得如此频繁，以至变成了习俗化的含义，然后习俗化的程度变得更高，到某一种程度变成说话者无法接受任何其他理解。

11

10 一个有趣的附带问题是说话者与对话者在使用不同语言时所需付出的努力相对不同。如果语言中对特定功能域的理解的大量强制制约都已习俗化，那么说话者将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来产生“合乎语法”的示意行为，而对话者将更容易找到具有关联性的理解；如果语言对特定功能域不做制约，那么说话者可能更容易产生“合乎语法”的话语，但是对话者将不得不在推测过程中付出更多的精力（同一门语言内部也存在这种说话者和对话者付出精力的相对不同，如例 1 中的不同回答）。我在另一篇论文（LaPolla 2005）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11 即使是会话含义，其默认理解也很强大。例如在英语中，动作按照被谈论的顺序发生这一会话含义非常强烈，因此一般说话者会说 *they got married and had a baby*（他们结了婚，生了孩子），这与 *they had a baby and got married*（他们生了孩子，结了婚）的意思非常不同；但是其会话含义可以取消，例如在它们之后添加 *but not in that order*（但顺序不是

汉语（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我们可以在方位动词“在”演变为进行体标记的语法化中看到习俗化的过程（Chao 1968: 333）。最初，对动作正在进行的理解没有制约，尽管当方位表达与动作动词构成连动结构（serial verb construction）时，存在一种该动作正在该位置进行的习俗化含义。随着时间推移，方位表达弱化为方位动词加上非重读指示代词，随着会话含义的增强，最后方位动词单独即可得出动作正在进行的强制理解。

会话含义、习俗含义和得出特定理解的强制标记之间的区别在于，说话者自由使用或不使用特定形式来制约听话者推测过程的程度不同，以及该形式强制得出特定理解的程度不同。古英语并没有使用词序来制约所指角色的识别，而是使用了复杂的格系统。但是，由于施动者的指称出现于动词前话题位置的频率很高，导致会话含义随着格标记系统的弱化而得到增强，直到成为现代英语的样子，即词序单独即可制约对主要所指角色的理解，而原来的主要方式即格标记系统现已消失，或者成为次要方式（如表现在代词上，但代词的格常常是由词序来决定的）。

跨小句同指的习俗化制约也以类似方式发展。最初，跨小句同指并没有句法制约，因此理解那些名词短语同指完全依赖于基于真实世界语义的推测（即根据关于世界的常识来得出意义）。例如，在下面来自缅甸北部的藏缅语日旺语的例子中，三种翻译中的三种同指模式都可行，哪一种正确，取决于对话者的推测，即推测在说话者在考虑

我说的那样）。

到对话者关于打人和哭泣，以及所涉人物的所知信息后，最可能想要对话者得到哪种理解。¹²

(2) əp^hũŋí ədú:səŋ ədip búà nù ɲú:a?mì

[əp^hũŋ-í ədú-səŋ ədip bú-à nù] [Ø ɲú-ap-ì]

Apung-AGT Adeu-LOC hit PFV-TR.PST PS cry-TMdys-INTR.PST

(i) “Apung 击中 Adeu ， (Apung) 哭了”

(ii) “Apung 击中 Adeu ， (Adeu) 哭了”

(iii) “Apung 击中 Adeu ， (其他人) 哭了”

不过这种类型的话语很少见，更多的情况是只涉及一个施动者，比如在 John finished eating and left (约翰吃完饭，离开了) 中，两个小句是同一施动者的会话含义 (最初只是会话含义) 会得到加强，直到习俗化为唯一可能的理解。比如在英语中，像 John put the rock next to the chameleon and turned brown (约翰把石头放在变色龙旁变成了棕色) 这个句子，只能是约翰变成棕色，即使它不符合常理；但在有的语言中，这种同指模式并未习俗化 (如日旺语、汉语、意大利语)，因此更有可能被解读为变色龙变成棕色。

随着非重读代词被重读代词或完整名词短语重复，动词的一致或

12 本文使用到的缩写：AGT 表示 agentive marker (施事标记)，INTR.PAST 表示 intransitive past tense marker (不及物过去时标记)，LOC 表示 locative marker (方位标记)，PFV 表示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完整体标记)，PS 表示 predicate sequence marker (谓语顺序标记，标记小句不是说话者的最后一个小句)，TMdys 表示 time marker (时间标记，标记过去几天内发生的事情)，TR.PAST 表示 transitive past tense marker (及物过去时标记)。在日旺语的例子中 (例 2)，á 表示高调，ā 表示中调，à 表示低调。所有以塞音结尾的音节都是高调。没有声调标记的开音节不重读。冒号标记的是非基本长元音。例子采用四行标注，是因为存在会使语素界限模糊的形态语音变化。在下面的昂尔米语的例子中 (例 3)，ā 表示中平调，â 表示低降调。

跨指称（cross-referencing）得到发展，非重读代词进而附着到动词身上。我们在印度东北部的藏缅语昂朶米-那加语（Angami Naga）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个过程（Giridhar 1980: 32、59）：动词前缀（1sg *ā-*, 2sg *ñ-*, 3sg *puô-*）很显然来自自由代词（1sg *ā*, 2sg *nō*, 3sg *puô*），并且可以与自由代词一起使用，如例（3a），或与名词短语一起使用，如例（3b）（参 LaPolla 1992a、1994 中来自藏缅语的其他例子）。

(3) a. *nō ñ-dōvī*

2sg 2sg-clever

“你很聪明。”

b. *nhîcûnyô puô-dōvī*

boy 3sg-clever

“（那个）男孩很聪明。”

名词短语上的关系标记一般来自方位标记，包括离格（ablative）和向格（allative）：开始时使用方位名词来把某个所指与其所陈述的情状的关系制约为方位意义，之后通过可预测的路径扩展到可以标记其他参与者（如施事，更多讨论见下文和 LaPolla 1995、2004）。

4. 句法关系为何发展？

我们已经看到，句法关系是从一种在话语中无限重复的形式，逐步习俗化并成为语言中的强制部分，此时就会强制得到某种特定的理解而非其他理解。但是，说话者为何会如此频繁地重复一种形式以至

发生上述情况呢？

答案在于语言使用者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一种形式若要经常使用直到习俗化，就必须以说话者认为重要的方式来制约对话者的理解，因为只有这样说话者才愿意付出额外的精力来制约对话者的推测过程，使得对话者更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换句话说，说话者希望确保对话者能够正确推测出交流意图的某个方面（相对其他方面），因此使用他（或其他人）以前无数次成功使用过的特定形式并以相同的方式来制约对话者的理解。（我们是习惯和模仿的生物，虽然有时会创新，但更多的是遵循习惯、模仿他人。）

在句法关系的情况中，对说话者至关重要的是对话者能够正确推测出主要参与者的角色。最清楚的例子是名词短语上的关系形态，如施事、受事和/或反施事。¹³对参与者角色的标记至少在一开始是标记语义角色。在我研究过的许多语言中（藏缅语；LaPolla 1992b、1994、1995a、1995b、2004），都是离格或工具标记扩展为施格标记，用来制约哪个参与者是施事，这个发展过程十分清楚。这开始于可能存在混淆的语境中（如当话语中提到两个人类所指时），并且在开始阶段是可有可无的。第一个这样做的说话者希望制约对语义角色的理解，为此使用了语言中已经存在的形式（如离格标记），因为使用语言中已有的成分比创造全新的成分更省力。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标记可能变得强制，也可能扩展到其他的施事所指。受事或反施事标记的动因一

¹³ 反施事标记与受事标记不同，它不是标记某个所指的角色是什么，而是标记不是什么角色：它标记的是所提及的人类所指（至少包括人类受事、与事，但有时也包括拥有者）并非施事。可参看 LaPolla（1992b、2004）。

样，但是说话者使用这些标记，是为了制约对非施事而不是施事角色的理解。在一些较古老的系统中，这种类型的标记可以超越简单的语义标记，因为说话者以新的方式使用语言中已经存在的成分（语义标记）来制约理解。

在某些情况下，习俗化的模式可能与说话者是否需要付出额外精力没什么关系，而只是反映了说话者的话语习惯（而这又反映了说话者的文化）。例如，在有的文化中，施动者经常成为谈论的话题，并出现在小句开头（这会影响理解环境的创造），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能会看到词序制约的习俗化，如英语。这种趋势在一些藏缅语中有所发展，例如羌语（LaPolla with Huang 2003），但尚未完全习俗化。比如在一个羌语的及物小句中，有两个无标记的名词短语指代人类所指，通常第一个会被理解为施事；但是语用仍然比语义更能控制词序，所以如果其他所指比施事更具话题性，那么指代施事的名词短语不会出现在开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施事标记常常被用来制约对话者对相对角色的理解。施事优先是默认和无标记情况，并且可能会通过重复发展为一种更稳固的强制理解。

对特定功能域进行制约的动因可能并非源于本土文化，也可能来自语言接触：有的语言会强制制约对某些功能域的理解，如信息源于何处，如果一些双语者频繁地使用该语言，就可能养成制约示证意义的习惯，进而认为自己的语言也有必要对信息来源的理解进行制约，他们使用自己语言中的成分来做到这一点，最终该成分就有可能发展为一种强制范畴。交流者尝试以某种方式制约对话者的理解，这种重

复行为最终导致习俗化，但在这种情况下，动因是通过另一种文化的影响进入说话者的文化的。至于句法关系的例子，似乎一些藏缅语中动词人称标记的发展与语言接触有关（参 LaPolla 2001）。

尽管所有的习俗化都来源于文化驱动的重复行为，但并不总能找到某种动因和语言形式之间的直接联系，特别是如果习俗化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但请参 Enfield 2002）。这是因为我们之所以继续使用这些形式，只是因为它们在那里，并且是语言使用习惯的一部分，尽管动因已不透明。我们可以在标记的加层（layering）中看到这一点，例如 *children* 中的 -r 复数标记的石化和保存，但大多数现代英语使用者并不将其视为复数标记。¹⁴今天在英语中使用的许多单词的动因对于现代英语使用者来说都是不透明的，但是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使用，例如我们把打电话叫作 *dial*（拨）。在某些情况下，语音改变会使过去透明的动因变得不透明，例如，汉语普通话中的“乌”可以表示“乌鸦”，动因很不透明，但我们查看它最初的发音方式（构拟为 *ʔa）时，就会看到它当时的动因是拟声。就句法而言，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证据来证明某种特定的词序模式的动因，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所产生的效果，并且假定这种效果正是动因所在。例如，英语中具有用词序来标记语气的模式，即不同的语气会在开头（主位）位置放置不同的元素，¹⁵这有可能是由于希望明确制约语气的理解而发

14 乔治·布什有句很出名的话：“**Childrens** do learn when standards are high and results are measured（当标准很高，结果被衡量时，孩子们确实能学到东西）。”（路透社，2007年9月26日）这表明对布什来说，-en 复数不足以制约复数的意义。这是一个加层的例子（Hopper 1991: 22）：当有人觉得现有的标记无法对特定语义域的推测形成制约时，就会发生加层。

15 在无标记的情况下，在陈述语气中，主语处于开头位置；在是非问句中，标记是非的

展起来的。

5. 结论

交流涉及示意和推测，语言的发展是说话者反复尝试以同样方式制约对话者对说话者交流意图的推测的副产品。句法关系之所以得到特别的发展，是因为说话者觉得有必要制约对所谈论的情状中参与者角色的理解。他们一遍又一遍地使用某些形式来做到这一点，因此这些形式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对理解的强制制约，即强制制约对该结构的理解范围，从而排除过去曾有的其他可能理解。

参考文献：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roft, William A.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ryer, Matthew S. 1997 Are grammatical relations universal? In *Essays on Language Function and Language Type*, J. Bybee, J. Haiman, and S. A. Thompson (eds.), 115 - 143.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Enfield, N. J. (ed.) 2002 *Ethnosyntax: Explorations in Grammar and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ridhar, P. P. 1985 *Angami Grammar*. (CIIL Grammar Series 6.) Mysor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
- Givón, T. 1989 *Mind, Code and Context: Essays in Pragmatic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Grice, H. Paul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Speech Acts*, P. Cole and J. L. Morgan (eds.), 41-58. (Syntax and Semantics 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助词处于开头位置；在疑问词构成的问句中，疑问词处于开头位置；在祈使句中，动词处于开头位置。因此，对话者对小句语气的推测（一般代表说话者如何与对话者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第一个成分（主位）的制约，这也影响了对话语其余部分的理解。主位（即主位-述位中的主位）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对话者听到主位后得出的推测会影响理解的其余部分（参 Halliday 1994: Ch. 3）

- Gumperz, John J. 1992 Contextualiz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Rethinking Context*, Alessandro Duranti and Charles Goodwin (eds.), 229-25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iday, M.A.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 Hopper, Paul 1987 Emergent grammar.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3: 139-55.
- Hopper, Paul 1988 Emergent grammar and the A Priori Grammar Postulate. *Linguistics in Context: Connecting Observation and Understanding*, Deborah Tannen (ed.), 117-134. Norwood, NJ: Ablex.
- Keller, Rudi 1994 *On Language Change: The Invisible Hand in Language*. Translated by Brigitte Nerlich. London: Routledge.
- LaPolla, Randy J. 1992a On the dating and nature of verb agreement in Tibeto Burm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55.2: 298-315.
https://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_1992_On_the_Dating_and_Nature_of_Verb_Agreement_in_Tibeto_Burman.pdf
- LaPolla, Randy J. 1992b Anti-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5.1: 1-9.
https://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_1992_Anti-ergative_Marking_in_Tibeto-Burman.pdf
- LaPolla, Randy J. 1993 Arguments against 'subject' and 'direct object' as viable concepts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3/4: 759-813.
https://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_1993_Arguments_Against_Subject_and_Direct_Object_as_Viable_Concepts_in_Chinese.pdf
- LaPolla, Randy J. 1994 Parallel grammaticalizations in Tibeto-Burman: Evidence of Sapir's 'drift'.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7.1: 61-80.
https://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_1994_Parallel_Grammaticalizations_in_Tibeto-Burman_-_Evidence_of_Sapirs_Drift.pdf
- LaPolla, Randy J. 1995a 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In Yoshio Nishi, James A. Matisoff, & Yasuhiko Nagano (eds.), *New horizons in Tibeto-Burman morpho-syntax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41)*, 189-228.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https://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_1995_Ergative_Marking_in_Tibeto-Burman.pdf
- LaPolla, Randy J. 1995b On the utility of the concepts of markedness and prototypes i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phological system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6.4:1149-1185.
https://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_1995_On_the_Utility_of_the_Concepts_of_Markedness_and_Prototypes_in_Understanding_the_Development_of_Morphological_Systems.pdf
- LaPolla, Randy J. 2001 The role of migration and language cont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In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Case Studies in Language Change*, R. M. W. Dixon & A. Y. Aikhenvald (eds.), 225-25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_2001_The_Role_of_Migration_and_Language_Contact_in_the_Development_of_the_Sino-Tibetan_Language_Family.pdf
- LaPolla, Randy J. 2003 Why languages differ: Variation in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of constraints on inference. In *Language Variation: Papers on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Sinosphere and in the Indosphere in Honour of James A. Matisoff*, David Bradley, Randy J. LaPolla, Boyd

- Michailovsky and Graham Thurgood (eds.), 113-144. Pacific Linguistic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https://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_2003_Why_languages_differ_-_Variation_in_the_conventionalization_of_constraints_on_inference.pdf
- LaPolla, Randy J. 2004 On nominal relational morphology in Tibeto-Burman. *Studi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Hwang-chenng Go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Ying-jin Lin, Fang-min Hsu, Chun-chih Lee, Jackson T.-S. Sun, Hsiu-fang Yang, and Dah-an Ho (eds.), 43-74.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https://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_2004_On_Nominal_Relational_Morphology_in_Tibeto-Burman.pdf
- LaPolla, Randy J. 2005 Typology and complexity.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Change and Emergence: Essays in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James W. Minett and William S.-Y. Wang (eds.), 465-493.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https://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_2005_Typology_and_Complexity.PDF
- LaPolla, Randy J. 2006. On grammatical relations as constraints on referent identification. In *Voice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Festschrift for Masayoshi Shibatani, Tasaku Tsunoda and Taro Kageyama* (eds.), 139-151.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ttps://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_2006_On_Grammatical_Relations_as_Constraints_on_Referent_Identification.pdf
- LaPolla, Randy J. 2009 Chinese as a Topic-Comment (not Topic-Prominent and not SVO) language. In Janet Xing (ed.), *Studie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Functional approaches*, 9-2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https://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_2009_Chinese_as_a_Topic-Comment_Language.pdf
- LaPolla, Randy J. 2017 Notions of “subject”. In Rint Sybesma (ed.),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 3, 231-238. Leiden: Brill.
- https://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_2016_Notions_of_subject.pdf
- LaPolla, Randy J. 2022 Grammatical Relations. Chapter 5 of Robert D. Van Valin Jr. et al. (ed.), *Cambridge Handbook of 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ttps://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_2022_Grammatical_Relations.pdf
- LaPolla, Randy J. with Chenglong Huang 2003 *A Grammar of Qiang*, with Annotated Texts and Glossary. (Mouton Grammar Library 39.)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ttps://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_and_Huang_1996_A_Grammar_of_Qiang.pdf
- LaPolla, Randy J. and Dory Poa 2006 On describing word order. In *Catching Language: The Standing Challenge of Grammar Writing*, Felix Ameka, Alan Dench, and Nicholas Evans (ed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ttps://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_and_Poa_2006_On_Describing_Word_Order.pdf
- Lehmann, Christian 2002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In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Ilse Wischer and Gabriele Diewald (eds.), 1-18. (Typological Studies in Language 49.)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Levinson, Stephen C. 1995 Interactional biases in human thinking. In *So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action*, Ester. N. Goody (ed.), 221-2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irce, Charles S. 1940 *The Philosophy of Peirce: Selected Writings*, Justus Bucher (e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Reddy, Michael J. 1979 The conduit metaphor—a case of frame conflict in our language about language. In *Metaphor and Thought*, A. Ortony (ed.), 284-3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erber, Dan and Deirdre Wilson 199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Valin, Robert D., Jr. 1977 Ergativity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subjects.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689-705.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 Van Valin, Robert D., Jr. 1981 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ergative languages. *Studies in Language* 5(3): 361-94.
- Van Valin, Robert D., Jr. and Randy J. LaPolla 1997 *Syntax: Structure, Meaning, and Fun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randylapolla.info/Papers/Van_Valin-LaPolla_1997_Syntax-Structure_meaning_and_function.pdf
- Wilson, Deirdre and Dan Sperber 1993 Linguistic form and relevance. *Lingua* 90: 1-25.
- Zipf, George Kingsley 1949 *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Ecology*. Cambridge, Mass.: Addison-Wesley Press, Inc.